

爱国同奋斗 肝胆两相照

——纪念周素园先生诞辰 120 周年

贵州省委统战部 省文史研究馆

清政府曾将他列为秘密谋杀的革命党要人。

袁世凯曾把他当作“双重罪人”下令通缉。

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的头目曾延揽他为“入幕之宾”。

国民党特务曾企图将他杀掉或劫持出逃。

毛泽东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是一个奋斗的人”！

邓小平请他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时说：“素老负责意义主要是联系群众。干脆说，只要有你的名字摆在那里好了！”

他说他是“桥”，群众也说他是“桥”，沟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他，就是周素园。

贵州民主革命的先驱

周素园，字培艺，1879 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城。他幼年深受封建书香门第的熏陶，长于辞章之学、思辨之理，也有“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抱负。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既是中国

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大转折，也成了周素园人生旅途的第一个思想转折。深重的民族危机，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植根在他心中。他从此发愤自强，努力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寄希望通过改良社会、维新变法而解民困，振国威。他深信“注意教育以开民智，提倡实业以抗外力”，并曾先后在毕节、普安教书育人，又曾经营贵州全省铁路矿物总公司，发展贵州实业，作为救国的起点。然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对于内忧外患交加、积贫积弱至极的清王朝已经无济于事。周素园又转而鼓吹爱国救亡，变革社会，开启民智。于是，他创办了贵州近代第一份报纸《黔报》，既当主编，又当经营者。后又与自治学社的领导人张百麟共同筹办《西南日报》，并担任主编。在传播新思想、新学识，揭露清王朝及贵州社会的腐朽黑暗，促成贵州自治学社向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转化，促进贵州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等方面，周素园和《西南日报》起了积极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周素园参

与策划贵州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主动承担运动贵阳警界支持革命党人反清。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被推翻后，贵州军政府成立，周素园被推举为行政总理。

军阀黑暗统治下的苦苦求索者

1912 年 3 月，以刘显世为代表的贵州封建势力联合唐继尧部滇军颠覆了贵州军政府后，周素园为挽救革命，流亡重庆、武汉、北京、上海等地，联络云流星散的革命同志，组织黔人冤愤团，奔走呼号，伸张正义。从此，他为躲避贵州军阀当局和袁世凯的搜捕而四处亡命。

1923 年至 1924 年间，周素园寓居上海，为了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广泛地接触各界人士，阅读各种书报，吸收各种思想理论。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和实现的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周素园开始接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也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初步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他依稀

看到自己多年所追求的救国救民的真理，正闪耀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1925年9月，周素园决心不再屈从于军阀的威胁，回到故乡毕节，闭门读书著述，反思自己10多年间在政治风云中的得失，探索自己人生的正确道路和中国的出路。他倾心研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并开始信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道理，认为它比自己以往所认识的各种理论都更有魅力，应该在中国实行。

长征路上特殊的红军战士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转战贵州，使周素园的人生转折与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交汇在一起。根据他的经历、声望和现实表现，军团首长请他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他慨然允诺，立即全身心投入工作。

周素园参加红军长征时，已经57岁。由于他一生坎坷，体弱多病，在气候恶劣的黔西北和滇东北的深山密林中转战，其艰难程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当时，贺龙、王震、肖克等红军领导准备拨出一笔款，动员周素园到香港一边治病，一边做统战工作。他激动地说：“我死也要死在红军里！”红军指战员也深受感动，表示抬也要把周先生抬到目的地。

周素园跟随红军渡过金沙江，穿越了原始森林，爬过雪山，于7月下旬到达甘孜时，得知李宗仁等在6月1日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后，便以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的名义，在红军电台发表了《对李宗仁元电广播

稿》，希望李宗仁能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到达甘孜以前，他一直与王震同吃同住，有时还同床而卧。王震对他不仅百般体贴照顾，还给他讲解了许多革命道理。在过草地时，贺龙省下自己的口粮送给周素园，使他热泪盈眶，勇气倍增。9月，到达甘肃岷州。在成立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时，周素园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2月，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在历时9个月，行程近万里的长征中，周素园深切体会到红军“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阶级友爱，更坚定了他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斗士

在陕北，周素园除了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员，自己编写教材，给红军战士讲授历史外，主要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他为了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先后给何应钦、张学良、吴忠信、朱绍良、王伯群、冯玉祥、张道藩、张继等数十人写信，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联共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他兴奋异常，准备随时跟八路军一道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为此，他给远在贵州的家人写下愿为抗日而献身的遗书似的赠言。但是，由于他的足疾复发，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党组织和同志们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他深为不仅不能上前线杀敌，反而“坐享优待”不安。特别是贺龙夫人、肖克夫人常

去看望他，替他缝补洗涮，送药，送吃的、用的，更使他觉得自己是“累赘”。于是，他萌生了回贵州继续做统战工作的念头。他将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毛泽东。10月6日，毛泽东给他回信，同意他的请求，并称赞他说：“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是一个奋斗的人”。

周素园携带着毛泽东、朱德致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亲笔函离开了延安。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他都冒着风险，向国民党当局者剴切陈词，要求他们切实履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条款，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虽然由于当局百般阻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他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并动员了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他深知抗战前方药品匮乏，捐资购买了两万盒云南白药邮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分发到前线。

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间的桥梁

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毕节。他担任了毕节县和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抱病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和肃清敌特工匪，建立人民政权。不久，应五兵团苏振华政委和杨勇司令员的邀请，周素园来到贵阳，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稍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7月，他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并请他担任贵州省人民

政府副主席。他以年老病弱婉言推辞。刘伯承说：“素老年高，我们是缜密考虑的。寻常例会，你不必出席，重要事件再请你参加。”邓小平更说得直截了当：“素老负责意义主要是联系群众。干脆说嘛，只要有你的名字摆在那里好了！”推心置腹的坦诚，满腔的信任尊重，深深地打动了周素园，他没有理由再推辞了。

在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改任副省长）任上，周素园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3年贵州文史研究馆成立，他又担任了第一任馆长。周素园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了建国初期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他曾说过，他愿当一座桥，沟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人民群众也把他当作桥，通过他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如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以及少数人骚乱等方面的政策性问题；如对发展贵州教育、团结知识分子、扶助农工商恢复和发展生产等问题，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大部分都被党委和政府采纳。他分管全省文教方面的工作，重要文件都是自己起草或批阅，从不假手于秘书。但凡与分管的工作相关重大的事项或政策性问题，党委和政府决策时都充分倾听他的意见，并且能迅速达成共识。难怪苏振华政委曾说过：“再也找不到比周素园更合适当副主席的人了。”周素园的身体不好，经常带病工作。省党、政、军领导都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专门责成省军区的医生为周素园看病。省领导常勉励

他，并对他说：“你的存在，就是对贵州，对国家的贡献！”

1951年10月，周素园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王震、肖克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单独与他畅谈达40分钟之久。周素园回到住处，连夜给毛泽东写信，给政协写提案，对在贵州发展交通、开发矿产资源、加强医疗卫生工作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这些建议，都被全国政协所采纳。

1956年11月，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左”的做法已经显露出来，农民群众也有不少意见，周素园十分忧虑。经过反复思量，他决定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建言献策。但在全国上下头脑都开始发热的当时，他的意见理所当然得不到支持，信也没有能够寄往北京。4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周素园的这封信，回顾那段历史，他在信中所表现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高度责任感，以及他与共产党肝胆相照，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无私无畏情怀，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文史研究的典范 自律自强的楷模

周素园自幼聪明好学，少年即以文章著称，一生笔耕不辍，即使在颠沛流离之中或面对死亡危险的时候，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担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时，对馆员尊重、爱护和关心，并且率先垂范，积极撰写文章和整理旧作，全力推动贵州的文史研究工作。他一生中留下的著述达300多万字，不少著作在

解放前不幸散失。他的一部分代表性著述辑录在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素园文集》中。文集的内容十分广博，横跨了中国近现代史三个历史时代，覆盖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涉及数百个历史人物，反映了他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是他九死一生追求光明的呼号，反映了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转变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艰难历史。周素园的著述和他的经历一样，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贵州解放以后，周素园身居要职，有职有权，日理万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从1950年至1958年逝世前，他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达30余种。他还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外历史、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他阅读时，每有心得体会，便记录下来。他以自己敏锐的思想和飞扬的文采，结合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阅历，经常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

周素园在建国初期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和思想改造中，自觉地把家庭和思想摆进去，严格地解剖自己。他从不以职权谋私利，而总是以普通百姓的心态去对待党和政府给予的荣誉和优待。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缺点很多，“不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没有申请入党。”但他对亲属子女的要求却很严，要他们勤劳节俭，好学上进。当他得知子女中有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有的正在积极争取，他欣慰地说：“假使你们都奉共产党为依归，我死也瞑目了！”